

余英時老師—— 早年的回憶與永久的懷念



2014年出席余英時獲頒唐獎漢學獎的座談會入場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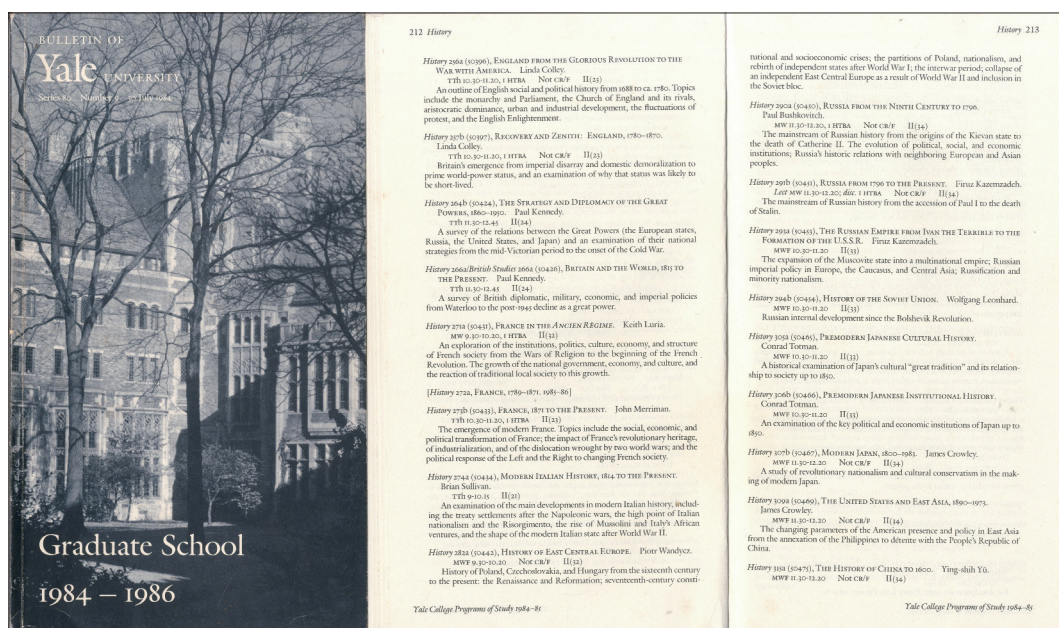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37期 2021.12

余英時老師駕鶴西歸，不巧遭遇時疫肆虐，聚會追思不易。乃應李所長之請，略記與余老師往來之事，以見余老師待人處事之周到及其對世人影響之深遠。^①

我本人在一九八四年到耶魯大學歷史系就讀博士班，指導老師為史景遷教授。當時系中共有三位中國史教師，大致以西元一六〇〇年為界，分擔教研工作。史景遷之外，另一位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助理教授也開設一六〇〇年以後的中國史課程。余老師一個人單獨擔當一六〇〇年以前中國史的教學，並且指導研究生。我到耶魯的第一年，余老師只在大學部有課，我就去旁聽了幾個星期。沒有繼續，因為隨著時間前進，課業壓力排山倒海而來，連美國同學見面問好，都變成“*What's up?*”或“*Are you surviving?*”我作為外國學生，不懂應付作業（assignments）的竅訣，左支右絀，即便焚膏繼晷至更移三鼓也還焦頭爛額，只好「中輟」旁聽的課。承余老師諒解，實在慚愧！我雖然與余老師在耶魯有三年的時間重疊，卻也就沒有再進他的教室。

但在教室之外，經常得到余老師的照顧。除了在研究生院走廊巧遇的交談外，他也給了我不必先約就可以隨時到他研究室「聊天」的邀請，讓我隨時擔心塞在「瓶頸」的處境，有了一個「叫天天應，叫地地靈」（*deus ex machina*）的護持。



余老師開課的課名：“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見右邊那頁最下一欄

① 稱余英時院士為老師，實係當面之時如此稱呼，積為習慣，無由更改。

耶魯在新港市（New Haven City），余老師家在橙郡（Orange County）。兩地之間頗有一段距離，要有車子才能來往，而我不能開車。旅美的前兩年，我尚未婚，余老師也掛念此事，每逢余家有聚會，或者適逢中國年節，余老師總找我去，而且還幫我安排便車。不便時，則更勞煩余師母 Monica 接送。

當然，每次我都盡貯吾腹。更厲害的是，腦袋也裝到豐盛的大補帖。余老師在橙郡的房子頗為寬敞，聽說在地下室有個很大的書房，或說是書庫吧！（應該就是最近很多媒體刊登的照片所見。）記憶中，我沒下去過，或者僅是轉了一下而已，未曾逗留。我也沒有在橙郡的院子蹣跚的印象。

通常我一到，余老師就讓我和其他客人進到起居間，閒聊——其實，我也只能答話，講不出什麼東西。余老師總是興致高昂，分享一點儒林外史，更多的是他的心得創獲。我因為在臺大碩士班時作過粵海關監督的研究，因此用心留意重要內務府包衣的傳記。然而要不是余老師拿出麟慶的《鴻雪因緣圖記》^②，並且娓娓細述他的想法，我到那時候都還不認識完顏氏這個重要的內務府家族。當夜之後，我從麟慶的生平研究開始，後來也作了一些相關探索，發表過幾篇與這個家族有關的文章。^③此外，余老師也提到《鴻雪因緣圖記》可以說是清代繪圖本自傳的先聲之一，於是我才注意到也為自傳配圖的張維屏《花甲閒談》^④與張寶《泛槎圖》^⑤。後面這兩位作者和我經常研究的廣州都有密切的淵源。

另一件事也頗值得一提。讀者皆悉一九八〇年代後期臺灣有一股「韋伯熱」，文化界、學術界的人都熱中閱讀、討論馬克思·韋伯的各種著作。當中頗受矚目的是韋伯所提出的新教倫理影響資本主義精神的說法。我在耶魯也修習西歐經濟史，主要修了兩門 Harry A. Miskimin 老師開的課。Miskimin 老師是 Carlo Cipolla 的高足。他教我重商主義以及中古後期經濟史，都屬宗教改革之前的事，尚不涉及基督新教。

有一回，過中國年，又和幾位同學到余老師家當食客。過了 11 點鐘，同學紛紛起身告辭，我也打算搭便車離去。余老師說：他們美國人可以走，你就留下來陪我聊天跨年吧，天亮再請 Monica 送你回去。結果是余老師生公說法，我則是頑石點頭。——我不是茅塞頓開，而是打盹不止。

其實，我也不是完全聽不懂，我只是不慣熬夜。特別是想要放鬆的場合，眼皮和脖子都不聽使喚。余老師那晚講了不少東西，其中一項就是講他怎麼讀馬克思·韋伯，還不時翻出他在哪一頁看到什麼，有什麼想法。有大成就的前輩學者是這樣念書，我倒一時被驚嚇到完全清醒過來。

② 我到美國的一九八四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正好翻印了道光二十九年的原刻本，有人捐了一套給余老師。

③ 最早的一篇是：Kuo-tung Ch'en, "The Wanggiyan Clan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Proceedings of the 35th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Taipei: United Daily, 1994), pp. 41-52.

④ 我喜歡用的版本是傅斯年圖書館藏、道光·咸豐年間刊本，《張南山全集》第 25-28 冊。

⑤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

我個人在大學時讀過張漢裕先生從德文本翻譯過來的《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⑥，不過我也只是囫圇吞棗，也只知悉一些表象。但要能像余老師那樣熟稔，自分沒有可能。那夜過後，雄心大起，決定猛K一下英文本的《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挑這一本來讀，因為它最薄，而且以前讀過中文版），找來了有名的 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英譯本抽空詳讀。我後來為本院週報動手寫〈貿易離散社群〉^⑦一文時，靈光一閃想到了韋伯曾經提到喀爾文教徒（Calvinists）逃離故鄉後在寄居地所形成的社群。Talcott Parsons 在翻譯這個概念時，使用的字眼正好是“diaspora”這個字。^⑧相隔約二十年還能對 Parsons 的譯本有點印象，實在是一時激動，東施效顰的意外結果。

無論如何，韋伯所謂基督新教倫理影響新教教徒勤勞忍欲，從而在事業上大放光彩這件事，在一九八〇年代韋伯重返的年代，也影響到經濟發展成功的四個東亞經濟體——所謂「亞洲四小龍」的臺灣、韓國、香港以及新加坡——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發展特別成功的問題。基督新教當然不是這四個經濟體的固有文化，可是這四個經濟體顯然（至少從表面來看）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廣泛浸潤。會是儒家思想在背後促成「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嗎？於是，儒家思想與經濟發展之間有何關係的討論一時蔚為風潮，貫穿著整個一九八〇年代。

我人在耶魯，掙扎於功課壓力之下，竟然不知余老師其實就在那時候發表了〈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篇大文，隨即以單行本方式由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⑨我遲鈍到過幾年返臺後才認真拜讀。余老師的這部論著，發表的時機不比他人晚，但論述的方式與內容卻別有特殊高明之處。他沒有侷限在新儒家，而是將禪宗、新道教都帶進來討論，時間上更往上追溯，而不僅觀察明、清兩個時代。

我和余英時老師一起待在耶魯的時間只有三年。余老師在一九八七年轉任普林斯頓大學，我也於一九八七年赴英研究。其後與余老師見面，大多是與他的粉絲們在他演講的講壇下挨擠，此外就是陪友人到他喜歡下榻的福華飯店看他，以及少數的飯局。

因為驚鈍，也因為我的主要研究是形而下的經濟史，老實說能與余老師在知識上互動的地方很有限。但是個人從閱讀他的著作而獲益的地方卻是更僕難數。我和許多一九七〇年代在大學、研究所唸書的人一樣，都是被他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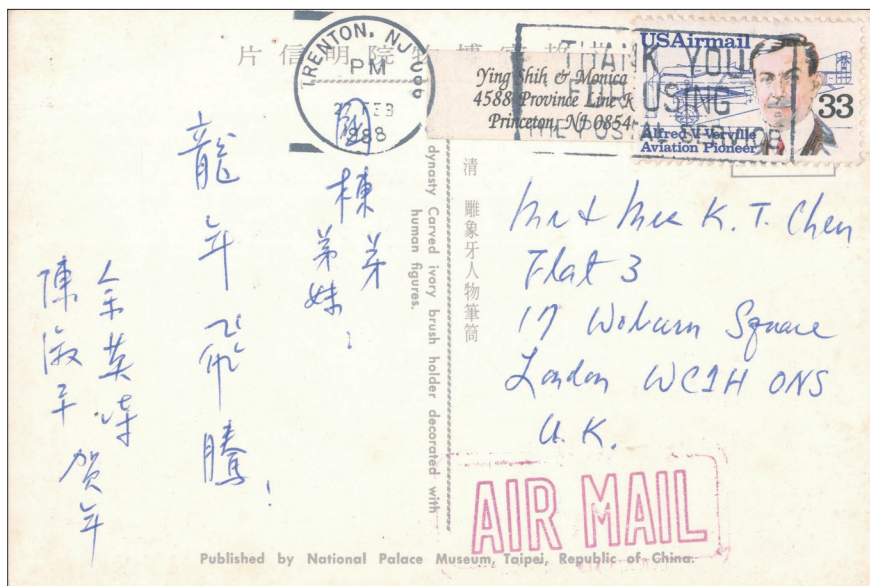
⑥ 臺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1960。

⑦ 〈貿易離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中央研究院週報》1075（2006.06.2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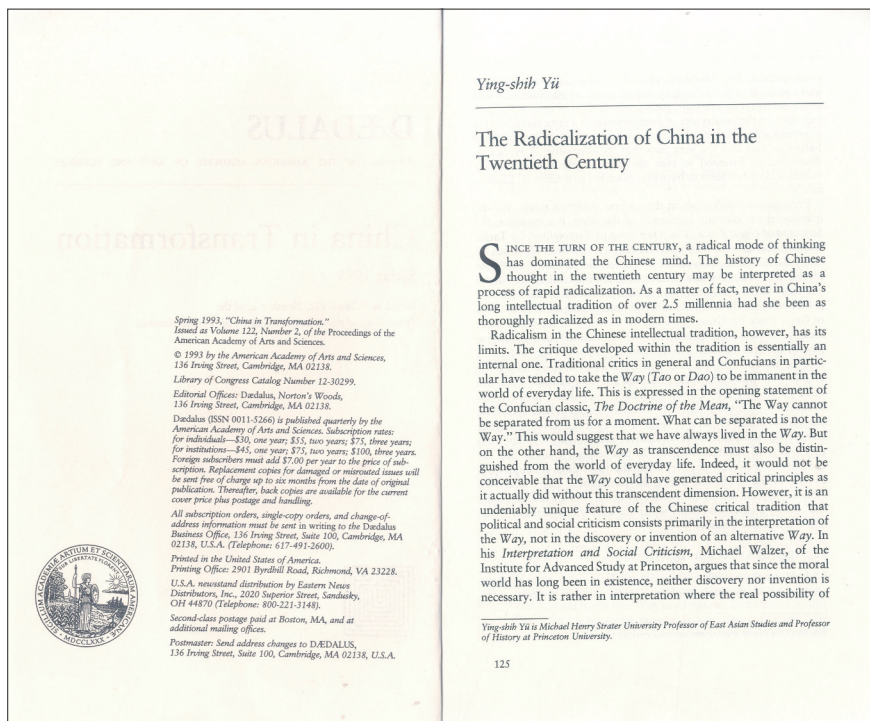
⑧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alcott Parson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6), p. 43.

⑨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文先發表於香港《知識份子》季刊，1986年冬季號；單行本《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初版的時間為民國七十六年一月。有趣的是余先生在該書的〈自序〉中卻說「初稿刊於《知識份子》季刊1985年冬季號，顯然在使用西元與中華民國紀元時，像一般人一樣，發生了困惑而誤寫。」

這篇文章開啓了眼光。此後，即使生吞活剝，也要努力去啃讀能拿到手的余先生¹⁰的每一件作品。



1988 年初收到余老師從普林斯頓寄來的賀年明信片



1993 年 7 月余老師到臺北，我到福華飯店 1046 室看他。那時〈二十世紀中國的偏激化〉這篇文章剛在 *Daedalus* 刊出，我幸運地獲贈一份抽印本。

¹⁰ 在和余老師見過面以前，我和同學、朋友都稱他為「余先生」。

多數讀者應該是在《歷史與思想》那本書中讀到〈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篇文章。我們那一代的年輕人則躬逢其盛，都是在《聯合報》見報之日，去搶報紙一睹為快。〈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從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五日止，連續七天刊出。余英時老師自己清楚講過分次刊出的這篇系列文章的發表過程，照余英時老師的說法，他最初寫〈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

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我想揭示的是：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⑪

更早，他也在《中國時報》提過寫作該文的動機與背景：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我回到香港工作，這兩年恰巧是「四人幫」橫行中國大陸的時候。「四人幫」是反智論的極端分子，公然宣稱「知識越多越反動」。^⑫

「四人幫」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等四個人構成的集團，在所謂「文化大革命」（1966-1976）後期掌權，採取極端統治，殘民以逞。余先生在香港擔任新亞書院的院長，多所聽聞，蒿目傷心，於是發為此文，同時也是為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七六年元月號「十周年紀念特刊」而寫。因為各種非他能掌握的因素，意外地先在臺灣刊出，也在臺灣引起一時的騷動與長遠的影響。後來，他在同一家報紙又發表了〈「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一文，很快地都收入同年出版的《歷史與思想》書中，讀者人眾之廣，難以估計。^⑬

余先生指出古今中外都不乏反智論的例子，而工商界、宗教界都存在有反智的人。他湊巧說道：

當代美國最有名的宗教領袖葛蘭姆（Billy Graham）便對知識份子極端敵視，認為他們有頭腦而無靈魂，最多只能算半個知識份子。^⑭

葛蘭姆在臺灣被稱為葛理翰，這個人就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到臺灣舉行大型佈道大會，萬頭攢動。我與幾位同學也因為好奇心的驅使，參加了十月二十九日在臺北綜合體育場舉行的第一場，全場據稱有五萬人參與。

⑪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38年〉，《聯副電子報》4620（2014.04.19）。
<https://paper.udn.com/udnpaper/PIC0004/257005/web/>

⑫ 余英時，〈從「反智論」談起〉，《中國時報》1979.03.14。

⑬ 〈「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的副標題正是「〈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刊出於《聯合報》1976.04.12-16。《歷史與思想》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初版時間為1976年9月。

⑭ 余英時，〈從「反智論」談起〉，《中國時報》1979.03.14。

不過，余英時老師的重點在中國。他認為在中國，傳統政治與道德難免凝合而成某種反智風氣。他研究戴震，戴震看到社會上一般人「以意見為理」，用理來苛責他人，以至於「以理殺人」。余老師認為戴震的觀察與思考非常理智，值得參考。他也認為研究一個人的學術與思想，並不是要去同意他，而是要去客觀地、理性地了解他。這些主張，對四十五年前的我來說，極端受用。

《聯合報》刊出〈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系列文章，固然是為了針對「文革」的亂象而發，但是會在臺灣引發熱烈的討論，也確實有其時代背景。稍早，分裂為南北兩部的越南已經進行了多年的內戰。一九七五年開年以後，南方的越南政府軍節節敗退。到了四月三十日，南越就向共產黨支配的北越無條件投降。同一年，臺灣政局也發生重大變化。先是蔣介石於四月五日去世，不久之後，六月九日菲律賓與我國斷絕外交關係，七月二日泰國也與我國斷交。蔣介石的逝世與國際局勢的變化，至少讓當時的知識份子或熱血青年去思考集權統治的問題。一篇為批判「文革」弊端而發的文章，卻也掀起戒嚴體制下的漣漪。

余英時老師於一九三〇年出生於天津，祖籍是安徽潛山，青少年時也在潛山鄉居過九個年頭。當中國大陸山河變色之際，他的父母先轉來臺灣，但與當時來臺的若干人士一樣，對臺灣的前途沒有信心，很快地就轉往香港定居。¹⁵ 余老師本來並沒有打算離開他所就讀的燕京大學，卻因為到香港探視父母，終究也未能北返，更成為錢穆先生的入室弟子，與錢先生創辦的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結下不解之緣。¹⁶

如同余老師在回憶錄中所言，早在一九四八年以前（不滿 20 歲），他已經吸收了許多「五四」新文化的價值，包括科學與民主。最初他「在顯意識的層面是接受了中共政治綱領的¹⁷，因此，並未感到在大陸曾受到壓迫。」因此之故，當初是沒有離開北平的打算。然而到香港探親的際遇讓他潛意識中熱愛自由、理性的天性勃發。旅居香港的幾年間，他寫了《民主革命論》，呼籲要建立健全的革命精神——「在這樣一種革命精神的感召與控制之下，革命才能熱情而不盲目，積極而不殘酷，建設而不妥協。」¹⁸ 他在一九五三年年底寫好了〈代序〉，次年出版。¹⁹ 一九五五年前往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於是就進入哈佛大學就讀。

一九五〇～一九五五之間四年多旅居香港的經歷，讓余老師與香港有了一定程度的連結。因此，一九七三～一九七五這兩年他慨然應邀回母校擔任新亞書院的院長。

¹⁵ 這樣的心態，可參考 Iris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2003), ch. 16, "The Taiwanese Americans."

¹⁶ 詳情請看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2018）。

¹⁷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

¹⁸ 余英時，《民主革命論》（臺北：九思，1979），頁 7。

¹⁹ 余英時，《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

余老師說更早一點的一九七一年他還訪問了日本，來過臺灣，也回去過香港。這幾年的感受，導引他選擇經常以中文來寫作的決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吧，他說：

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傳佈到西方漢學的小圈子以外（當時西方漢學遠不及今天這樣流行）。恰巧 1973-75 兩年，我回到香港工作，重新運用中文變成了理所當然之事。這是我的幸運。從那時起，我便決定先用中文寫出比較詳盡的研究報告，然後再以英文另撰簡要的論文。因為我的教研崗位畢竟是在美國，發表英文論著仍是我義不容辭的專業任務之一。^{②①}

學術研究當然要注重精專、注重科學，自然與人文皆然。不過，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往往要透過迂迴的加值利用，才影響到常民的生活。可是，人文研究的心得是有可能直指人心。余老師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一流大學教學研究，與同行分享研究結果是責任，也是當然的貢獻。然而他的研究創獲，針對的正是中國、華人的歷史與文化，透過中文寫作，直接而不必經過轉述地讓使用中文的人分享他的睿智，說明了他的體貼。試想，披覽千餘頁《朱熹的歷史世界》^{②②}津津有味的人，能不感謝余老師的這份好意嗎？出版時，他已經過了古稀之年，仍然經營不懈，就是為讓他的創獲方便與真懂中文的讀者見面！

余老師在《歷史與思想》一書中引用他人的名言說：「我是歷史家，我愛人生」。^{②③}其實他也愛同胞，也愛世人。如今他今世的塵緣已了，但他的言談警效彷彿仍在；而他的思慮見識也將隨著他的文字長久流傳。

^{②①}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38 年〉。

^{②②}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2003）。

^{②③}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頁 260。